

社會運動與學術研究

《左工二流誌》的衝擊*

從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逐漸形成一個「運動場域」，不停地對台灣社會「做工」(work on society)。在沒有前例、沒有資源的匱乏環境下，鄭村祺與夏林清創辦的工作室，以長期蹲點的基層經營策略，紮實地耕耘工會運動，開創出台灣社會運動場域中的嶄新局面。吳永毅的自傳見證了這個過程。這是一本勇敢、坦誠的自傳，涵蓋了吳永毅參與工運抗爭與鄭夏工作室的經歷。對於自傳中呈現的「生死以之，置生死於度外」的決心與在抗爭過程中展現出來的高峰經驗，我只有欣賞、感動、讚歎與佩服。這本傳記對於社會運動界、學術界與一般讀者，都會帶來重大的衝擊。對於社會運動界，這本自傳會帶來有關組織訓練的方法、社會運動路線等的討論，這一部分，我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發言。對於學術界，這本自傳會帶來有關現象建構與知識創新的反思。對於一般的讀者，則會從吳永毅獻身自己選擇的目標與在逆境中的奮鬥經驗中得到激勵。底下，我將聚焦在這本自傳對於學術研究的影響，兼論它所帶來的激勵與反思。

一、學術研究上的意涵

這本書產出了什麼樣的知識？它可以替學術界注入了什麼樣的活力？

* 本文為「台社論壇——工運組織者失語年代的告白」(2014年5月18日，台北月涵堂)之發言修訂稿。

比這本書早了四年，邱毓斌(Chiu, 2010)的博士論文，比較了台灣與香港的工會運動。他發現：台灣的自主工運面對的是相當平順的民主化，但卻迴避了激進的工會主義而選擇擁抱國民黨留下的政治遺產，如廠場工會，從而限制了自主工運後續回應新自由主義的能力。相反的，香港面對的是相對敵視的環境(親商、政府不介入勞資關係、工運無政黨支持等)，其自主工運卻表現為積極的社會運動工會，所謂的「社會運動工會」，指的是積極組訓、經營草根、擴大聯盟、推動社會改革，面向未來。為什麼兩地的工會運動出現這樣的差異？他提出的答案是：台灣的自主工會承繼了廠場工會的制度遺產，工會領導的「勞資生命共同體的想像」，以及工會幹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疏離，從而無法發展出社會運動工會。前兩個因素在這本自傳所描述的勞資爭議與衝突中都看得到，而第三個因素恰恰是這本自傳的作者現身說法所要處理的，他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和工運幹部的疏離可以改變，改變之後，就有可能讓台灣的工會朝向「社會運動工會」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這本自傳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灣工運的限制，以及突破這些限制的途徑。

但這本自傳的貢獻不僅僅局限在工會運動本身，它對於了解台灣勞資關係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勞資關係有承平、衝突與斷裂的時刻。這本自傳對於衝突與瀕臨斷裂的勞資關係，勾勒出不可化約與不可替代的圖像。一般的學術研究者甚難進入衝突與斷裂的核心，去考察內部的張力、動力以及攸關工作、身體乃至於性命的賭注。再者，有別於夏林清(1993)有關罷工和謝國雄(1997)有關勞資爭議的研究是從勞動者的角度切入，這本傳記則是從組織者的角度來勾繪，這是這本自傳獨特的地方之一。

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上，這本傳記也揭開了兩個黑箱。目前的研究都指出了四個因素影響了社會運動的出現與成敗：不滿、政治機會、組織動員，以及框構，就是重新形塑參與者的意義世界。這樣的架構有一個大黑箱：這四個因素到底是如何整合起來發揮出整體的力量？這本傳記提供的答案是：組織者，它細緻地描繪了組織者如何偵測到不滿、掌握到政治機會、進行動員與訓練，藉以與宰制者周旋。

揭開了第一個黑箱之後，第二個黑箱隨之而來：組織者本身又是如何養

成的？組織者通常會被看成個體，可是這本傳記指出一個關鍵：組織者也需要被組織，就是說，組織者他是要透過一個集體生活才能持續在運動現場工作。那麼組織者的集體生活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它與一般在學校、企業、軍隊等組織中的集體生活有何不同？這是這本傳記無可替代的價值所在，因為它記錄了完全獻身於這個組織與保留自我間的張力，以及既規訓又支持組織者的集體力量。在現代以個體存在當作最終信念的社會中，如何可能將個體毫無保留交出給組織？這是吳永毅在考慮加入鄭夏工作室時的猶豫——他對於個體消融於組織有著強烈的焦慮。但在加入這個工作室之後，他卻發覺集體所產生出來的力道又讓人十分的折服，然而集體生活又會帶來一些衝突、緊張跟傷害。換言之，組織者的集體生活具有雙元性。這樣的經驗，大概只有宗教的皈依可以比擬。在這裡，這本傳記觸碰到社會生活中亙古的難題：個體與集體的關係。

與此相關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這個問題。大部分人的基本的生活單位是家庭。雖然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有不成家或多元家庭的這種發展趨勢，但大體而言，家庭仍是我們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在這本傳記中，吳永毅面臨了家庭跟工作室的拉扯，然後他做了一個非常激進的實驗，就是他離開家庭進入工作室，這個過程充滿了高度的張力。這樣的經驗也可以讓我們重新去反思，社會生活裡面的基本單位到底是什麼？它可能變化嗎？

很自然地，**社會秩序**的問題就油然浮現。我們大部分的時刻依循規範生活，大部分的研究也都在探討依循規範的社會生活。但是在這本傳記報導的幾次重大的工人抗爭，都是挑戰既有規範；因為挑戰了既有規範，讓我們看到一些社會底層的運作軌跡，從而創造了一些新規範形成的可能空間。相對於社會學一向著重的規範的繁衍，這本自傳呈現了規範的挑戰與重塑，促使我們反思社會秩序的形成與改變。

最後一個很重大的貢獻是揭示**行動的可能與效應**。挑戰既有規範要付出代價，但它所帶來的效應卻是廣泛而深沉的。例如，在《中國時報》中南編輯部的抗爭中，抗爭者體會到金錢的補償已不是最重要的，在抗爭中的學習更有意義：壟斷企業溫室裡順服、自傲的員工，學習面對赤裸裸的叢林法則。

airiti

或者體會到：如果不抗爭，無法面對自己，也就是必須透過抗爭來重建被資方羞辱的自我認同，以及在長期參與工運的過程中，重新發明自己。（《左工二流誌》，頁375）社運創造了一個「沙盒」，讓平常不可能組合的力量元素碰撞，提供人們發現自己的機會。社會運動發揮類似「魔鬼訓練」的作用，讓當事人回到日常生活時有更多的勇氣和技術資源去面對權力。（同前引頁）換言之，抗爭是行動者對社會做工，這個做工會引來社會的反制，但就在這個過程中，行動者展現並且開發了他的可能性。類似這樣的故事就是一篇篇震撼、鼓舞人心的史詩。

這些故事充滿了潛力，如果能進一步深挖，將可以大幅推進學術研究以及知識創造。

首先，鄭夏工作室主要是透過「行動科學」作為一個實踐的原則來運作的，這個工作室在台灣已經成立二十幾年了，在經過這些在地的實踐之後，這本傳記讓我們看到它發揮了非常重大的力量。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台灣這些在地的經驗，對於行動科學，可以提出什麼樣的反思與挑戰？舉例而言，吳永毅第一次申請加入工作室時，被問到了有關「領導與民主」、「領導與性別」、集體的分工、性別與階級的優先順序（同前引，頁301），以及集體與個體的相生相剋、團體的封閉與開放、工作室與其他工運團體的關係、微觀的行動科學實踐與宏觀的社會整體圖像的連結等，都是行動科學的在地實踐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如能正面處理，將可以深化行動科學。

其次，這本傳記一開始就關注知識分子的角色，也是因為這個困擾，吳永毅選擇了全然投入運動。社會學中接近這個立場的是法國社會學家Alain Touraine（1988）的「社會學介入」（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就是社會學家進入社會運動裡面，在運動裡面擔任激發與促成對話的協調者，藉此，與運動者共同發現個運動的意義與方向（「歷史性」（historicity））。社會學介入中的社會學家仍然與運動者有別，但是吳永毅的實踐已經消弭了這個分別，而以運動者的角色出現。所以我很期待他能透過這樣的經驗，重新反思社會學介入。

接著是有關社會運動與能動。衝突和集體行動可以重新形塑認同與展現能動，新社會運動（如性別運動、環境運動等）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這點。然

而吳永毅所組織跟帶領是傳統的工運，必然有一些有別於新社會運動的獨特性，從而可以對運動與能動議題，提出原創論點。

最後，是有關社會運動的反思：「運動」到底是什麼？運動是抗爭？運動是組訓？運動是工具或者運動本身就是目的？在歷史性（以及更具體的社會情勢分析與整體戰略）與現實的權力擴張之間，社會運動要如何兼顧？這本傳記對於這些問題，可以提出新的論點嗎？

二、學術研究與社會運動

吳永毅曾經在學院與社會運動之間徘徊，最終選擇了運動，也在運動場域上發光。放在更寬廣的光譜來看，學術研究可以有五種作用：控訴（批判統治者）、代言、揭露結構運作的邏輯、彰顯行動者的意義世界，以及偵測未來發展的趨勢。¹ 學術研究聚焦在第三與第四個作用，但逐漸開始留意第五個作用。吳永毅作為工運的組織者，接近發揮了控訴與代言的作用，但他實際上超越了代言人，成為組織者。他以組織者的身分在第一線對抗國家暴力與資本主義，從而揭露了這兩種結構力量平常甚少顯露的運作邏輯。再者，在抗爭的過程中他也協助行動者對自己的行動、動機、意義與行動的效果有更好的理解，² 以 Touraine (2001: 116) 的話來說，「縮短了『行動』與『行動者對自己的再現』間的距離」。換言之，在帶領工人抗爭的過程中，他非意圖地揭露了台灣資本與國家的運作邏輯，也呈現了行動者意義世界，雖然後二者並非其預期之內。吳永毅精彩地體現了第一與第二個角色，不經意地發揮了第三與第四個作用。

吳永毅的自傳對於學術研究的衝擊，可能不在吳永毅的意圖之內，但卻在無意圖的情況下，對學術研究帶來重大的影響。反過來說，有沒有可能，

1 Touraine (2001: 107-110) 原意是知識分子的四種角色（控訴、代言、彰顯意義、偵測未來）。我做了兩點增補：一是新增「揭露結構運作的邏輯」，二是將學術工作者當成知識分子，同樣也企圖發揮這些作用。

2 當然，行動者的意義世界不限於在抗爭中所呈現者，參見謝國雄（2013）。

學術研究的原始意圖並非壯大社會運動，但卻也因為如此，反而有可能對社會運動做出貢獻？這必須視學術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定，如果學術研究能進行踏實與細膩的分析與詮釋，結合宏觀與微觀，關照承平與衝突時期的社會生活，並且帶入認識論的反省與終極關懷，進而做出兼顧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的學術研究，那麼在善盡本分的努力下(謝國雄，2007)，學術研究是否有可能非意圖地對運動做出貢獻呢？例如，上述有關社會運動、社會秩序、集體與個體、基本單位與能動等議題的深刻研究可以對台灣社會運動有所貢獻。

三、向前行

最後，有幾個面向未來的問題。

一個理想的運動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這本傳記的答案可能是，他要具備兩個能力，一是「一流人」的能力，就是他分析整體局勢，提出有力與有效的策略；二是「二流人」的能力，就是能在基層進行長期的組訓。可是這本傳記也告訴我們，要結合這二者並不容易。假設其他的運動團體被這本傳記說服，想要結合這一流人跟二流人的運動策略，他們要如何著手？

其次，這本自傳證明了鄭夏工作室的內部組訓與蹲點的「二流人」模式具有強大、堅韌與持續的力量，但也點出了其中的一些代價，如「運動傷害」。作為「和團體(即工作室)對峙的文本」，這本傳記的寫作與出版是否有效地處理並解決了「運動傷害」？

第三、傳記通常有勵志的作用，讀者想要瞭解並且學習：這個傳主在追求什麼？他的理想是什麼？他為什麼要追求這個？用什麼方法去體現？因為吳永毅擅長說故事，預期讀者自己會從故事中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如果能更聚焦地表達出來，並且連結到具體的運動實踐，說不定會帶給讀者更深刻的啟發與鼓勵。

從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場域有不少像吳永毅一樣獻身運動的人物，期待他們也能撰寫自身奮鬥的傳記，攜手豐富社會運動場域的圖像，

airiti
替後世留下無可取代的遺產。

參考書目

中文

夏林清(1993)《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有關台灣勞工生活的調查報告，1987-1992》，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7)(主編)《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英文

Chiu, Yu-Bin. (2010). *Haunted by the Past, Organizing the Future: Independent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DPhil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Essex.

Touraine, Alain.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01). *Beyond Neoliberalism*. Oxford: Polity Press.